

晚清「清流」功与罪

□任九光

光绪初年，大乱初平，为巩固政权，增强统治，清廷广开言路，问政群臣。一批官阶不高的文学侍从之官，才学优长，建言献策，抨弹大吏，互相援应，借势而起，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要政治力量，被称为“清流党”。名噪一时的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宝廷、邓承修、盛昱等都跻身清流之列，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潘祖荫在幕后隐为支持，慈禧也对清流大加赞赏，提拔重用。

然而，流风所煽，士类寄望幸进，清流党人从闪亮登场，流变为呼朋引类、排斥异己的利益集团，在保守与激进之间展现出与外在形象截然不同的另面。

清流未必都有真才实学

很多清流党人自幼攻读圣贤书，学富五年，文采斐然。加上年轻气盛，不畏当朝权贵，敢于公开弹劾，张佩纶就曾弹劾过军机大臣王文韶、吏部尚书万青藜、户部尚书董恂、工部尚书贺寿慈等高官，一时震惊朝野。张之洞也曾弹劾东乡惨案的涉案官员，一举将多年冤案昭雪，使滥杀无辜的原四川提督等官员遭受极刑，而且在中俄改约危机期间，提出了应对危机的系列举措，得到慈禧的高度评价。然而，士子自幼学习的是八股文章试帖诗，严重脱离实践。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之后，反而需要花更大功夫在练习蝇头小楷上，以便写出好奏折。翰林院散馆仍然考诗赋，成绩好的，才能外放担任各省乡试考官、学政。青年时期的宝贵时光，全部耗费在书本知识上，根本没有实践磨炼的机会。清流党多是当时正途出身的优秀人士，文章做得越好，越缺乏实践能力。曾纪泽就曾指出，认为最上等的清流人士也只是“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泥古不化，不切实际。

实践出真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正因缺乏实践能力，所以在光绪初年凭借华彩文章崛起的清流，在光绪十年爆发的中法战争中就遭到重大打击。在对外关系上，清流人士虽不知战守之策，却空口言战，高倡爱国。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前，慈禧以“因循萎靡”罢免全体军机大臣，改组军机处，重用清流成员，分别任命张之洞为两广总督、吴大澂为北洋海疆会办、陈宝琛为南洋海疆会办、张佩纶为福建海疆会办，将打赢战争的希望寄托在了清流党人身上。然而，真正的战争远不是清流派写奏折那么简单。风头最劲的张佩纶上任不久，法军舰队就突袭马尾军港，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马尾造船厂被毁。陈宝琛因推荐徐延旭、唐炯作为前敌主帅，兵败之后承担连带责任而连降五级。吴大澂在中法战争中未有作为，但在此后的中俄勘定边界中既“未能亲往履勘”，又受汉奸所愚，导致黑瞎子岛被沙俄占领，乌苏里江

行船受限。缺乏实践能力的根本弱点，使得才华优长的清流人士经受不住复杂的实践检验，从而难免被历史淘汰。

早期清流中唯一留下来的张之洞，在中法战争中力挽狂澜，为取得镇南关一凉山大捷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迎来更广阔的洋务事业，也是因特殊的个人经历而在青年时代受过艰苦磨炼的。16岁时，张之洞就在顺天府乡试中夺得头名解元，一时轰动京城。然而此后经历了军中剿匪、丧父、家乡办团练、幕府当幕僚等实践磨炼，才奠定了成长的实践基础。因而张之洞格外注重经世实学，强调从实践出发，不仅自身取得诸多洋务建设成就，而且提倡士子学习能够发挥实际作用，“国家养士，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士人博极群书而无用于世，读书何为？”实践造就人才，可以说在张之洞和其他清流身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清流未必都是正人君子

清流是知识分子的代表，视地方督抚、洋务人士为“浊流”，不屑与“浊流”交往，动辄吹毛求疵，联手弹劾。慈禧重视清流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欲借力整肃朝纲。

慈禧对清流开幸进之门，士子闻风而动，清流群体越来越大，投机分子越来越多，成员道德水平也越来越低。个人道德有亏不知检束，反而自居“名士”，以“小节有疵，大节不亏”自我放逐，从诗酒酬唱、金石书画发展到优伶面首、声色犬马，于妓馆中“置酒宴客，流连竟夕，天明始散”，奏折中义正词严文字的背后，充斥着封官许愿、攻讦钻营等甚至为“浊流”所不齿的行为。

清流不清，这一点早被看穿。曾纪泽就揭露部分清流党人之所以拼命攻击洋务，是因为自己得不到利益而由妒生恨，“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以媚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刘坤一也曾抱怨，“所谓清流，未必果识正人君子，且未必尽属正人君子也”，指责清流人士为“伪君子”。

清流误国亦不浅

晚清洋务建设中确实出现腐败、舞弊等很多问题，清流的攻击很多都是实际情况。然而清流一旦成为清流党人，形成利益团体，攻击和指责就成了攻击对手的借口，打倒政敌成了最高目标，洋务建设本身则相应退居其次了。以翁同龢为首的后期清流，党同伐异更甚，党派利益高于一切，国家利益成为政敌相攻的工具，最终应验了刘坤一所说“害且中于国家，而身家亦随之决裂”的悲惨局面。

翁同龢是光绪帝老师，长期担任军机大臣，主管户部，但与李鸿章为敌，千方百计克扣北洋水师拨款，导致北洋水师自1888年建成之后再未增添一艘军舰，难以维持日常运转。中日战争爆发前，翁同龢又坚定主战，拉拢文廷式、张謇、志锐、盛昱等清流，大肆散布日本是“蕞尔小国”的言论，敦促李鸿章与日本开战。通过一手控制拨款，一手逼迫开战的手段，以割让台湾岛、赔款两亿两白银的代价，翁同龢打倒了头号政敌。甲午战败之后，翁同龢痛下决心，表态要支持光绪帝自强。然而，对政敌依旧如故，仍然克扣张之洞主办的汉阳钢铁厂的经费，导致钢铁厂始终难以正常运转。这一比日本八幡制铁早建成投产七年的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险些因缺少运转经费而被卖给外国人。在翁同龢等人的眼中，攻击政敌仍然高于国家利益之上。

清流党人和平时时期攻击建设者，战争时期攻击作战者，自己虽文不能献策、武不能统军，却以正义自居，牢牢束缚了晚清洋务改革的进程。李鸿章少年得志，但自办洋务后，“三十年来无时不在被谤”。李鸿章之兄、两广总督李瀚章抱怨，“近年奖章繁密，动虞触碍，而部中徇官言之议又加甚焉。一人不合，罪及全案；驳而复奏，罪及荐者。此二百余年未有之科条也”，不敢推动改革。张之洞出身清流，担任新疆大吏之后成为后期洋务运动代表。然而张之洞并没有因为出身清流，就得到清流人士的同情，反而因为洋务建设规模更大，受到攻击、诋毁也更多，心中凄楚溢于言表，“十年以来，辛辛苦苦，众谤群疑，皮骨仅存，生意已尽，沟壑之期会已不远”。有旁观者指出，少有的改革者“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碍闻，则群起而诿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而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



今年是作家柳青逝世4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曾多次提及柳青，指出党政干部也要向柳青学习。党中央号召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柳青崇高的担当品格仍然值得当今干部学习。

——编者

□林 宁

1953年3月，37岁的作家柳青为了深入生活搞创作，毅然辞去陕西省长安县委副书记职务，在该县王曲区皇甫乡皇甫村安家，这一住就是14年。

14年里，柳青始终把党的干部身份放在第一位，坚定地扛起了基层干部职责，亲身参与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呕心沥血为乡亲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用他的思想和行动树立起那个时代农村干部勇于担当的光辉形象，深受基层干部、群众的爱戴。乡亲们亲切地称他为“咱们的柳书记”。

坚守实事求是精神

1962年，柳青在回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的信中谈到了自己扎根皇甫村坚守的一条工作底线：“在任何情况下，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他说：“实事求是，有的时候比较容易，有的时候不容易，要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要牺牲生命。要坚持实事求是，有时剩下一个人了，也要坚持，不动摇，要坚持你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坚守实事求是精神，难的是在不容易的时候坚守，那需要强大的担当定力，柳青就是这样的坚守者。

1953年至1955年，柳青通过参与从互助组发展到初级合作社的具体工作，总结出农业合作化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他一直坚信这么一条：“没有农民的自愿，互助合作就没有前景，要以发展生产来吸引农民参加合作社，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法驱赶人们走合作化的道路。”1955年下半年，全国刮起了靠行政命令急速推动全面成立高级合作社的旋风，也刮到了长安县。面对来势汹汹的这股冒进风潮，当时负责指导王曲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柳青不为所动，专门找来了长安县委副书记安于密、区委书记孟维纲，根据本区合作化的实际情况谈

“咱们的柳书记”

——作家柳青的干部担当



作家柳青（左一）与皇甫村民交谈

了他的意见：绝不能跟这阵风，现在时机还不成熟，不要急于推动全面成立高级合作社。大家商定，先试并已建的初级合作社，制定一个三年生产规划，让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消除人们对转高级合作社的种种顾虑，以后再看情况全面推动成立高级合作社。最终，柳青没能阻挡住上级的行政命令，还被严肃教育了一番，可贵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精神。

1958年8月，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每个生产队办一个公共食堂，吃大锅饭。虽然柳青不在公共食堂吃，但他不时到各队食堂走走看看了解情况，听到有不少人私下说食堂不好。深入调查后，他总结出公共食堂“四个办不成”（粮食、煤炭、肥料、思想四个方面不过关办不成），认为再办下去会造成严重后果。揪心的柳青一面通过大队干部向县委反映“四个办不成”，一面和他们商量了一个“应付着办”的方法，上面来检查时食堂开办集中吃饭，检查过去了食堂停办分各家吃饭，就这样办办停停，直到1961年中央提出解散公共食堂。

坚决清除不良社风

柳青认为合作社要搞好，必须有良好的社风，一旦发现不良现象一定要狠抓思想教育见苗除根，否则后患很多。皇甫村的重点社——胜利合作社能形成心齐劲足的良好社风，成为长安县农业合作化的典型，得益于他这个驻社干部坚决清除不良社风的担当魄力。

胜利合作社建社不久就闹出一次分社风波。柳青十分了解每个社员的身世和生活，在跟闹分社的社员思想交流中，一起慢慢回忆他们过去的穷苦经历，通过忆苦思甜触及灵魂，提高觉悟。对柳青这一招，社员们都佩服他说到人的骨子里去了。性格强硬坚决要分社的副主任董炳汉经过柳青多次谈话，后悔地哭了，后来在社员大会上作了

深刻的检讨：“我原来是要饭的，要到这里，没钱没地，租的冯家的地，现在当了副主任、副业组长，还嫌不行；生活刚好了，可又闹着分社，把这个社闹散伙了，让大家再受穷，对不起大伙。”柳青认为团结事大，他还借机请来县上几个干部，加上区乡干部，对每个社员进行深入的谈话教育，让搅乱的人心再团结起来，防止再出现破坏团结的不良风气。

对社主任王家斌这个当家人，柳青管教特严，要求他时刻注意，一点点坏事都不能干。有一次，新来的驻社干部向柳青报告，说王家斌到县上开会，走前这也没安排好，那也没交代妥，社里的账也乱着。柳青一听，心急火燎跑到县上，在县委门口和王家斌碰个正着，对他劈头盖脸就是一通批评，批得他眼泪哗哗。后来柳青发现批评错了，向王家斌道了歉。王家斌深有感触：“柳青平常见面哈哈一笑，有了不对处，脸上模样就难看了，话也严厉得够受。”

有人反映社里的不良现象，柳青一定要查清楚，然后进行警示教育。有社员反映对社办的油房管理不放心，他亲自到油房调查，很快了解到管理员杨永春近来常把饭带到饭里。情况明了后，柳青专门为此事召开社员大会，严肃批评杨永春：“饭拿来，开始用筷子蘸一点，吃着挺香，以后拿着油壶倒一点，胆子越来越大，再往后就敢拿个瓶倒些提回家，不要看开始是个小事，以后就成了大事。你也提，我也拿，这社还能好吗？”他把这件事发展下去对个人、对集体的害处说得很严重，以此教育大家：“集体的东西，哪怕一棵麦穗都不能私自往家里拿，大家一心把社办好，社才能好。”

坚定一心为民管事

村里有人问柳青：“你在县上

是分管啥工作？”他风趣地回答：“凡是群众需要我管的事，我都管。”有人把柳青叫作“百事管”一点不为过，对群众的事找上门的要管，看到的、听到的也要管。

这种“百事管”的担当胸怀，是1943年3月柳青被派去陕北米脂县吕家硷乡做了近三年的文书工作中磨炼养成的。柳青后来说到那段工作的感悟：“写介绍信、割路条，吵嘴打架，种棉花的方法，甚至于娃娃头上长一个疮有无治疗方法，都应该找你。假使你要是厌烦，表现冷淡，老百姓就比你更冷淡，开会你说你的，他们吃他们的早烟，你说完了，他们站起拍打了屁股上的灰坐走了，你的工作不会顺利。”

柳青管上的事，在把它办好之前，他就会一直放在心上。有一年，王家斌从外地买来良种水稻把老品种全部换了，可这种新品种水稻长势缓慢，有些群众说起了风凉话。王家斌急了找柳青想办法。柳青担心这件事办坏了影响合作社发展，便从县里请来农业专家帮助他们解决技术问题，又帮着买来化肥。这样还不放心，早晚都去田头察看，直到水稻长高结穗，一颗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

柳青看到皇甫村周边几个村子，多年来流传一种“粗脖子病”，就走门串户了解得这种地方病的原因。当他知道主要是这里吃的水有问题时，又寻方问法，建议他们吃碘盐、打深井，以期从根本上消除这种地方病。他还多次与王家斌、董炳汉等社队干部商量打一眼深井。1966年春季，董炳汉带领一帮人在村北终于打成一眼14米的深井。打井期间，柳青天天去看。深井打成出水这一天，他一直守在井边从中午到下午，连午饭都忘了吃。

有时大晚上碰到一些紧急的事，柳青不会等到第二天天明去处置。他说：“事情弄不明白，我夜里睡不着”“一夜没睡觉是小事，群众的事是大事。”1959年深秋时节的一个晚上十点多钟，两名队干部匆匆奔到柳青家向他报告队里的大青骡突然病倒了，请求帮助。柳青双脚急促敲打着地面，紧皱双眉，口里一个劲地“啧啧”着。他很快收拾了刚翻阅的一堆资料，等两人喝够了茶水跟他们一起赶到队里的饲养棚，和大家一起想办法抢救，一直忙到下半夜终于使大青骡转危为安。

人物志

曾国藩：人要常怀愧对之意

□游宇明

同治七年二月十五日，两江总督曾国藩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念人生苦不知足，方望溪（方苞）谓汉文帝之终身，常若自愧不胜天子之任者，最为善形容古人心曲。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福之门。如觉天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天；君之待我过优，我愧对君；父母之待我过慈，我愧对父母；兄弟之待我过爱，我愧对兄弟；朋友之待我过重，我愧对朋友，便觉处处皆有善气相逢。如自觉我已无愧无怍，但觉他人待我太薄，则处处皆有戾气相逢。”

上面这段话很长，中心意思只有一个：人要常怀愧对之意。所谓愧对之意，指的是一个人在各种利益面前要知足，懂得受之有愧，而不是到处伸手。曾国藩这段话是针对方苞的一个观点而引中的，表面上看只是读后感，其实是自己做人的一种理念。

曾国藩与胡林翼关系极好，书

信、日记里提到他，大多数用的是“胡润帅”（胡林翼字润芝）这样的明显有着亲切意味的称呼。曾国藩一遍遍地跟家人、朋友述说胡林翼对自己的好，比如胡林翼怎样为他筹饷，如何替他分忧，在皇上面前怎样替自己美言。胡林翼不幸早逝，曾国藩以两千两白银做奠仪，这笔钱可以轻而易举在京城买一所房子，足以及见出曾国藩对胡林翼的感恩。

曾国藩从来没有对人讲过，胡林翼当年离开贵州归入湘军不久，朝廷责怪他没有及时赴鄂，让曾国藩命令其迅速前进，曾国藩曾在奏折中极力为胡林翼辩护，还说“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将来可倚以办贼”。只要胡林翼取得一点军功，曾国藩一定会在奏折中大加赞赏。胡林翼后来由正四品的道员升为从二品的巡抚，曾国藩的举荐功不可没。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老部下，打仗很英勇，跟曾国藩个人的关系也非常好，曾国藩曾说：“次青于我，情谊之厚，始终不渝。岳州之

败，星驰来赴。靖港之挫，从人皆散，次青追随贱躯，不离左右。出则呜呜鸣愤，入则强颜相慰。”但像许多有本事的人一样，李元度这个人优点金光四射，毛病也十分显眼：一是报喜不报忧；二是说得头头是道，做起来轻率敷衍；三是冒票军功。徽州失手之后，不得已，曾国藩向朝廷参劾了他。然而，越到晚年，曾国藩越是想起李元度所做的那些好事，后悔自己的行为太激烈，几次向皇上上奏，千方百计加以补救。

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有愧对之意，便少有得失心。得失心少了，对个人利益不那么在乎，你就会看到别人对你的友好，也就愿意向他人付出善意。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曾国藩没有这样说，但他以另外一种表述，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见。

曾国藩主张人要常怀愧对之意，也有勉人上进的意思。愿意对他人付出善意也好，在事业上追求精进、完美也罢，本质上都是对生

命个体的一种超越，是对自身能量的一种激发。曾国藩智商平平，一个秀才考了三次，考进士最后中的也是“同进士”，左宗棠评价他：“欠才略”“才太短”“才艺太缺”“兵机每苦钝智”，他的学生李鸿章当面说他“儒缓”，他自己更是毫不掩饰地说过：“余性愚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时时有愧对之意，尽心尽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做京官，十年七迁，连升十级，身兼五个部的副部长；只是受命帮办团练，却成为剿灭太平天国的主帅，晚年更是官居两江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的高位。假如他没有这种理念，怎会有如此成就？

时怀愧对之意最后很可能会问心无愧，这是生活给我们的一个启示。